

今日关注

彻查“神探”是正义的第二步

□王石川(北京)

2003年杭州“5·19”奸杀案发生后,以聂海芬为首的杭州警方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,通过“突审”张氏叔侄,获得了该案“无懈可击”的“铁证”。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,此后又在审查勾海峰的犯罪事实时,“未发现”勾可能是“5·19”案真凶的重大线索。日前,记者获悉,浙江省政法委已成立调查组,彻查聂海芬等该冤案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人员。

(4月8日《东方早报》)

如果说张高平叔侄恢复自由身,获得清白声誉,意味着正义迈出了第一步,那么彻查“神探”聂海芬,问责冤案制造者,则是正义迈出的第二步。否则,正义必是局部的,残缺的。一定程度上说,如果不彻查聂海芬,就无法真正慰藉张家叔侄,也体现不出浙江相关部门纠错的决心和行动。

具体到聂海芬,对其彻查还有别样的意义。聂海芬有“神探”之称,而现在看来,“神探”的高帽实是巨大嘲讽。据张高平叔侄称,他们被连续逼供长达7天7夜,身上至今残留着被烟头烫过的痕迹。当时都是谁逼供?他们何时受到惩罚?当然,逼供者未必是聂海芬,因为张高平叔侄称从没有见过聂海芬,但聂海芬直接坐实了冤案的生成,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彻查聂海芬,不能止于张高平叔侄的冤案。2006年,一篇名为《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

芬同志荣获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》的文章称,“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‘三八红旗手’称号的女民警…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,准确率达到100%……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,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。”试问,这350余起“铁案”中,有没有别的冤案?目前看,有必要从彻查张高平叔侄冤案入手,一并盘查其余的300多起案件。

值得提及的是,3月28日,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刊文表示:“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,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,做到有错必纠,有责必查,绝不掩盖,绝不袒护。”而现实并不乐观。据报道,浙江政法界人士透露,检察院找到了当年办案的民警,挨个调查问话,但大多回复“时间长、记不清”,对于是否刑讯逼供,无人承

认。还有一个细节是,当初再审查张高平叔侄(为其平反)时,“(浙江)省政法委协调公检法,决定予以再审查,面对阻力省高院态度坚决,高院的意见最后起到了主导作用”。在此,应向浙江省高院致敬,但不容忽视那些阻挠势力:如果浙江政法委没有足够决心,也许就很难还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全部真相,更遑论严肃处理责任人。

彻查聂海芬等人,是为了还原张高平叔侄一个公道,也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,更是为引起人们反思,以杜绝刑讯逼供,遏制再炮制所谓“无懈可击的铁证”。事实上,新修订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,刑讯逼供收集口供不能作证据。问题是,刑讯逼供早就被抛弃了,为何至今仍有发生?很显然,如果不杜绝刑讯逼供,不确保“疑罪从无”代替“有罪推定”,即便聂海芬倒了,还有张海芬、李海芬……

媒体评说

新京报

何必着急推广“板蓝根”

没有一种中药会对所有的病毒都有效。板蓝根在中药中属于清热解毒的药物,主要针对属性偏热的病毒,可是H7N9病毒是不是在患者身上表现为“热邪”的特性现在还未可知,在这样的前提下,有一个省的卫生厅提示大家服用板蓝根来预防H7N9病毒,显然值得斟酌。面对可能的病毒疫情,医学人士和卫生部门的确应该积极为大众提供一些避免感染的方法,但这应该建立在一个科学严谨的态度上,而不是以一种类推甚至是有病乱投医的态度,给人们提供一些还没有得到证实的方法。事实上,病毒世界虽然多变,但其传播却有着其自身的客观规律,在我们国家,经过非典,我们的公共卫生水平较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现在H7N9病毒来了,虽然具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,但并不可怕,只要我们能从自身做起,注意公共卫生,保持良好的心态,避免接触可能的传染源,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开H7N9病毒的侵扰。

京华时报

红豆局长为何敢瞪眼说瞎话

称“地下水红色并不代表不合格”的河北沧县“红豆局长”被免职了,此次当地应对可谓迅速。而此前,工程院院士痛斥其“瞪眼说瞎话”,可谓快人快语,直指本质。出了事,官员“瞪眼说瞎话”,背后往往存在着行政不作为或者官商利益勾结。平时不谋其政,甚或做了坏事,出了事不能自圆其说,自然只能通过“说瞎话”来糊弄民众。而细究某些官员之敢于或者习惯于“瞪眼说瞎话”,根本原因还在于,一方面,调查机制存在问题,调查既不独立也缺乏公开,相关官员习惯性地不严谨;另一方面,“说瞎话”缺少责任追究机制,低风险高回报。事实上,不少官员或部门的“瞎话”,最终都湮没在不了了之之中。

钱江晚报

口头上的道德,帮不了社会

4月5日,长春一位老人在市场内因突发脑梗晕倒在地,在急救人员赶到前,12分钟内共有178人从老人身上跨过去,只有1名女子留下照顾老人。我们也许无法保证,那个救人的人,假如有一天自己碰到危险,一定会有人去救她;我们也无法肯定,救了人一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。但无疑,选择这样做的人多一个,社会风气就会往正面多走一步。你我是怎样,中国也是怎样,总是要求从别人做起,到头来终将一事无成。傻和精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,你不能总是只求回报不愿付出。傻是一种品德,这种品德就体现在对秩序的遵守、对良知的遵从、对诚信的坚守。停留在口头上的道德,帮助不了这个社会。

广州日报

到莫言旧居“抠墙皮”是病态崇拜

清明小长假三天,莫言旧居接待的游客超过千人。游客中既有单纯去参观沾“文气”的,也不乏“抠墙皮、挖砖块”的,有的墙角的砖头被人挖走了,有的墙皮被抠掉一块,游客声称带回去把土撒到家里沾沾莫言的“文气”。参观莫言旧居,表达对诺奖文学得主的敬仰本身也无可厚非。但非要附带功利性的沾“文气”目的,而且还以抠墙皮、挖砖块的非正常途径来表达,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崇拜。旅游就是旅游,参观就是参观,何必非要加上什么沾“文气”的功利意图?也不必留下什么“到此一游”的炫耀式手迹;而且要表达对文学的崇拜,那就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,而不应想着有什么捷径可走。

公民声音

“限购”并非内地奶企的机遇

□欧阳崧(郑州)

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举行,4月7日下午,蒙牛总裁孙伊萍在分论坛上表示,香港限购奶粉,对中国奶企来说,更感觉是一个责任和机遇。(4月8日人民网)

网民从香港奶粉限购令中看到内地奶企的“耻辱”,而内地奶企则从中窥到了机遇。于是,奶企的期待遭到网民嘲讽,蒙牛“机遇论”更是被部分媒体斥为“恬不知耻”。

在蒙牛总裁孙伊萍的眼里,香港奶粉限购令给予内地奶企新的发展机遇,内地奶企可以凭借增加的市场需求,步入发展快车道。然而,就限购现状和消费者心理而言,香港限购奶粉并不是所谓的机遇。

一则,面对巨大的商机,“扫货”和“水客”显然不会因为一纸禁

令就放弃可观的利润,他们只会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来采购奶粉;二则,香港奶粉限购令实施后,消费者看到的不是国产奶粉的热销场景,而是各国奶粉代购价格节节攀升,部分消费者宁愿多花钱;三则,内地奶企在香港奶粉“限购令”出台后,纷纷展示痛改前非的决心,但仍然难以得到消费者的信赖。

简单分析就能发现,代购在国内只是小众消费模式,因为能吃上洋奶粉的孩子毕竟是少数;限购几乎不会对国内奶粉消费格局产生大的影响,只是为内地奶企挤出了

可怜的市场份额。相对于其原有的市场份额而言,新增部分能有多少,还不得而知。因此,将香港奶粉限购视为中国内地奶企的“机遇”,未免是太早的乐观。

很显然,内地奶企要“浴火重生”,不能依赖洋奶粉的质量问题,更不能依靠所谓的“限购”机遇,而要自身“硬起来”。既要保障良好的品质,也要用制度维持企业信誉,增加消费者的安全感,让民众相信国产奶粉的产品质量。只有用良心和品质去重拾信任,才能抓住真正的机遇伺机“崛起”。

热点话题

“内部机密”是“核销贷款”的祸根

□刘克军(郑州)

河北深州市兵曹乡、唐奉镇农村信用社的一份核销贷款清单显示,43人“死亡”,15人“失踪”。记者走访却发现,至少有19名健在,副市长、公安局副局长等很多官员在列。深州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梁凤信说:“贷款核销信息是我们的内部机密文件,泄露出去是我们最大的失误。”(4月8日《新京报》)



梁凤信的一句大实话,捅出了问题的根源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“被死亡”、悄无声息地“核销贷款”?就在于它是“内部机密”。河北深州“被死亡”核销贷款一案中,究竟是谁给开的死亡证明?是谁最终审定核销?这些,不应该一直是“内部机密”。

“被死亡者”中有大量官员,甚至有副市长、公安局副局长等领导,他们必须自证清白。是真的毫无知觉“被死亡”,还是幕后有猫腻?是信用社忌惮“位高权重”主动弄虚作假“核销贷款”,还是死账坏账风险贷款的“填仓”之举?监管部门有必要一追

到底。同时,也要让民众知道,这些钱最终如何补偿。

梁凤信认为“核销贷款”的机密泄露,是信用社的“最大失误”。显然,这个秘密早已存在,只是未被泄露。那么,除了公开的两个乡镇,还有多少信用社存在类似的情况?难道就没有人追查核实?

长期以来,我们的征信和监管系统都是单方面的。民众信用不好,银行会有记录,会限制你贷款。可是,银行、信用社一旦信用缺失,或者遇到“位高权重”惹不起的、死账坏账风险贷款的,他们会不会为信贷评级而“核销贷款”?我们一直无从查证。

最好的监督,就是透明。把每一笔需要“核销”的贷款,每一个“死亡”“失踪”的人员名单公布在媒体上,接受民众的监督。只有土壤干净、程序透明,“被死亡”事件才不会再上演,被损害的公信才会被逐渐修复。



延长退休年龄未必能填补养老金缺口

□邓子庆(湖北)

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,养老金确有缺口,并建议通过延长退休年龄、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等方式弥补,并逐步形成政府、企业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的养老金制度。(4月8日《新京报》)

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去填补养老金缺口,至少有三点问题令人质疑。其一,社保预算能力差。正如有专家所言,政府在制度设计中就应该考虑到可能的结果,而不能在运行一段时间后,把缺口的原因归咎为社会老

龄化严重、养老金水平过高等。

其二,统筹层次有待提高。事实上,从全国来看,社保金盈余现象是常态。财政部去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数据就显示,年末滚存结余达2.98万亿元。这种看似矛盾的数据实则因为现有社保统筹层次太低,在全国非一盘棋的背景下,盈余地方的资金无法拿去填补亏空地方的缺口。这需要人社部加紧研究社保全国统筹办法。

其三,延长退休年龄未必就能填补养老金缺口。事实上,社保费率高低以及享受社保的条件限制,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经

济决策。去年广州在宣称提高社保缴费标准后,不少市民就表示将评估缴费压力决定是否退保。可以想象,一旦很多缴费者因为退休年龄过高、享受福利不是很多而退出,甚至吓跑潜在缴费者,有养老需求者又一直大量存在,养老资金缺口恐怕照旧很大,这无疑是不得不偿失。

事实上,填补养老金缺口的方式有很多,例如强化财政补贴力度、提升基金的收益率,抑或动用国有企业资金弥补等。比如,戴相龙也提到要“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”。就算非得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才能填补养老金缺口,其前提也该是公布养老金(社保资金)的具体运营、收支情况,进而砍掉不合理的运营成本,让民众心里有本透明账。